

郑州工地“霸占”上学路



8月27日,位于郑州市建设西路的西岗村小学附近,通往学校的道路被积水淹没,无奈上学的孩子只能涉水通过。

河南省郑州市各所小学校相继开学,多所小学校门前被各种工地围困,频频出现小学生“无路可走”现象,安全隐患让家长們很是担心。

CFP摄

打工夫妻 看守危石10年

每天巡查20余次,接车60余趟

本报记者 黄榆

本报通讯员 徐章位

8月19日,连续阴雨天气的六盘水毕节地区乌云终于散开,昆明市曲靖工务段管内水红线舒展在久违的阳光下,弯弯曲曲地横卧在崇山峻岭中,列车撞击钢轨的声音来回荡漾在山谷,悠远绵长。

“老乡,赶紧下来,不要走线路中间,不安全!”15时23分,《工人日报》记者一行穿过水红线北盘江大桥,在距离K57看守点20米的地方邂逅当班看守工陆发荣,见到线路中间有当地的行人。

K57看守点位于水红线北盘江大桥旁,陆发荣夫妻主要负责隧道出口危岩落石和边坡溜坍的看守工作。今年45岁的陆发荣和妻子赵吉书在这守了10年。

记者到达看守点时,陆发荣带上望远镜、信号旗,正准备上山进行4天一次的巡查,赵吉书留在看守点接送列车。“从这条小路上去,爬到山上对编号的危石进行检查,确认岩石间隙有无变化。”15时31分,来到毛脚堡隧道出口,陆发荣指着一旁坡度接近60度,宽不足半米的“路”,向记者说道。这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路”是陆发荣夫妇用了10年的时间踩出来的,他们也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行人。

“这几天刚下过雨,有点儿滑,你要踩稳抓牢,注意安全啊!”上山的途中,陆发荣不时回头看略显吃力的记者,担忧地提醒。一路上陆发荣边走边对“路”两边的危石进行检查、测量,确认无变化后,再继续往前走,动作熟练、敏捷。陆发荣说,他们分星夜班巡查线路,每天来回巡查20多趟,立岗接车60多趟,每隔4天还要耗费2个多小时爬到几乎垂直的山上巡查危石,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却有着毫厘无差的精细,每逢遇上下大雨,夫妻俩都无法休息,不间断巡查,死死看守住山上这些石头。

17时44分,全面检查结束。回到看守点,赵吉书给记者递上一杯热水,乘着闲暇,又忙着收拾他们的小菜地去了。记者饶有兴致地对他们的“家”参观起来,看守房内电风扇、热水器,小厨房内电冰箱、电磁炉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屋旁的一块菜地被鸡舍一分为二,分类种植着多种蔬菜长势甚好。

“我们这边买菜不方便,离家也比较远,现在蔬菜基本都是自给自足。”陆发荣摆放好巡查工具,填写完巡查记录本,走到屋外,看着鸡舍、菜地,面带笑容的看着妻子,颇感满足。“家用的东西我们都有了,单位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生活上的困难。”

“我们现在两个月的收入要顶原来一年咧,我们是六盘水市营盘村的,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就是粮食、水果,最高时一年净收入1万多元,老人要养,娃娃要养,日子不好过。”陆发荣咧嘴一笑,“现在我俩在看守点上班,2个月的收入就有1万多元,不但能供养2个小孩读书,还陆续购买了家用电器、摩托车,日子过得很安逸也很幸福,单位给了我们这份工作,我要加强责任心才能对得起单位对我们的信任。”

村级道路因工程量小、造价低,成为建筑领域监管的盲区

违法承包工程致修路工中暑身亡

人社部门提醒,只有自觉依法依规办事,才能真正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避免悲剧发生

本报讯(记者张昀)8月4日,49岁的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道村民张永树倒在了自己干活的道路施工工地上,再也没有起来。这一天,当地正在落实该省首次针对高温劳动保障的专项督察。不过,他所在的工地,因为工程量小、造价低没能被纳入监管,成为监管的盲区。

张永树倒下的这处工地位于江夏区乌龙泉街友爱村。这是一条连接江夏天子山大道与梁子湖之间的乡村水泥路,双向两车道,总长度1300米,8月2日开工。事发时,张永树仅仅工作了两天。依据现场目击者回忆,事发当天下午1时许,张永树

突然昏倒在路边不省人事,工头背起张永树来到项目部,为他吹电风扇,并喂“十滴水”和“人丹”等防暑药品,观察了约半个小时,见其依然昏迷不醒,工友们于是将其送往江夏区人民医院。

当天下午3时许,张永树被送到江夏区人民医院,但因为中暑严重,身体过度虚弱,院方建议立即转院至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下午6时12分,张永树刚被送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院方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8月6日清晨6时许,医院宣布其抢救无效死亡。在医院和公安部门出具的《居民病伤亡医学证明书》中,张永树的死亡原因被认定

为:热射病(中暑),多器官功能衰竭。

依据相关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不过,依据当地气象部门的数据,事发时当地最高气温超过了35℃,但尚未达到37℃。当地相关职能部门表示,在这样的气温下,他们依然建议用人单位错开高温时段开展生产作业,以防止事故发生。可是,同样是因为工程量小,施工方为了保证道路混凝土可以一次成形,没有采取错峰施工的举措,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采访中,《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这是当地建立劳监部门以来的首例意外事故,其恰恰凸显出监管的盲区。依据相关规定,建筑工程的工程造价和造价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纳入住建部门的监管,其他相关部门也仅能由此会同住建部门,针对本部门的职权进行监管,而随着城市扩张,在城乡接合部甚至在乡村的工程项目,无法进入执法者的视野,一位执法者坦言,“无论多少次拉网排查,都无法查到,村民起一栋楼,请四五个工人,两三天就完工了,有的甚至是违建,还要和监管部门打游击,完全无法监管。”

“不仅如此,这样的用工往往没有劳动合同,用工者的劳动关系也很难认定,在张永树发生意外之后,其家属在律师的建议下,放弃了工伤保险索赔,虽然目前其家属已经与用工者达成了赔偿协议,但较工伤保险赔偿相距甚远。”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这项工程,包工头顶多也就赚四五万元钱,这次事故发生后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这位负责人说,事情发生后工头还私下找他问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事情。“事实上,只有自觉地依法依规办事,才能真正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违法分包中农民工受伤,发包方仍需担责

培国与原告满佳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使用劳动

者的承包人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由具备用人单位资格的发包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规定,满佳公司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2014年11月,建湖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第七条规定:“具

律师点评

仲裁确认劳动关系不是工伤认定的前提

石家庄市工伤职业病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张士谦律师跟《工人日报》记者分析称,本案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跳过了工伤认定前的劳动关系仲裁程序,使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得以适用。

张律师告诉记者,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劳动者还是按照“仲裁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申请工伤赔偿”

这样的复杂程序进行工伤索赔。他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劳动者不懂法或者相关法律师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为了避免自己作为被告拖入诉讼,往往将确定劳动关系这一争议焦点让劳动者另行劳动仲裁确定。

“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认定劳动关系过于繁杂,而且劳动者败诉的风险极高,不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王律师说,“最

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的请示》的批复中指出,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能。也就说,不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也可以通过相关证据直接认定劳动关系。再进一步讲,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确认劳动关系不是工伤认定的前提。”(杨召奎)

打工孕产妇 怕贵“逃”孕检

若经济条件不允许可去二甲医院,有省市可申请免费孕检

本报讯(实习生孔瑛琪 曾芸)孕检是准妈妈怀孕期间不可忽视的步骤,也是确保胎儿健康发育的基本保证。通过孕检能够确定孕周,排除危险性。确诊是否需要治疗以及能否继续妊娠。如此重要的孕期检查,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如何实现的呢?8月19日笔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在北京务工的王女士来自山东,结婚后夫妻俩通过打拼,有了一些积蓄,也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住处。她说,“现在我们的钱多一些,自然就会在这方面重视一些。我周围的人基本是两三个月做一次孕检吧,预产期到的时候会去得频繁一些。在镇上检查200多元,县级医院由于有B超检查,贵一些,300多元的价格,还可以接受。”

同样在北京打工的来自河南的李女士和张女士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李女士的女儿这个月正好一岁,提起当年孕检,她笑着说道:“我怀孕时就在北京检查过一次,剩下几次都是回老家的时候检查的,毕竟老家便宜一些嘛。”

“医院人太多,排队太麻烦,这边又有生意要照顾,孕检就一推再推了。”张女士一边拨弄着菜一边说道,“不过我发现,最近几年家里人注意多了,像我亲戚们他们在外面打工即使钱不够,也想办法做几次检查,孩子能健健康康地出生是大家的心愿嘛。”

笔者调查了解到,大部分医院有两种价位,一种是针对普通检查,还有一种是特需检查。普通价格多是200元到500元不等,第二种检查价格高一些。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通常采取第一种检查方法。

据了解,2013年,安徽省曾颁布相关办法,其中规定:符合生育政策并且准备怀孕的夫妇,且至少有一方为农业人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夫妇至少一方具有本地户籍或夫妇双方非本地户籍但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符合这些条件的夫妇,可自愿申请参加免费孕产前优生检查。但目前,对于怀孕以后的产检并没有相关的规定。

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医师王小蓉说:“医院孕检定价是统一的,两种检查方法孕妇可各取所需,对于农民工,医院无法区分,也没有特殊优惠。”

谈到农民工孕检普遍关心的价格问题,王医生说,“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会告诉她,哪些检查是必须做的,哪些可不做,会根据本人情况选择。如果实在无法负担,我们建议去二甲医院,做常规检查。如果发现问题再转到好一点的医院,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费用,农民工朋友们大可放心。”



雨中 “舞者”

8月29日,广州市三元里大道,一位工人披着塑料布在大雨中狂奔。

CFP供图

天津外来工纷纷创业自当“老板”

信息闭塞、缺乏职业谋划和资金支持是主要问题;政府部门需加大创业引导与扶助力度,建立创业风险保险机制

本报记者 姜明

本报通讯员 刘长海 姜示范

“我不甘心总是给别人打工,也要有自己的事业。”近日,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天津澳利矿产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保平高兴地说。多年前,王保平从山东乐陵初入天津打拼时,干过搬运工、司机、业务员、码头调度,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他都像“拼命三郎”一样。后来,他凭着扎实的工作在物流行业小有名气。不久,他被一家物流企业高薪挖走,迅速让这家企业扭亏为盈。

从为别人打工到创业

“我就是干点事业,让别人看看我们外来工也能行。”王保平最终选择了创业,成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自己担任经理。他的商业才华得以充分施展,不但从物流中获得财富,还进军矿产行业,成立天津澳利矿产有限公司,赚回数亿元资产,带动数百

人就业。

与王保平相仿,海滦纺织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关洪昌也是这样,他早年离别乐陵投奔远在天津的两个兄长,从事沙发外修这样的小行当。刚开始,只能每天站在码头招揽生意,由于影响市容,他曾被管理人员追赶了十多里路。但是,每当他拿到一单生意时,总是全力做到极致,这种踏实与认真,让关洪昌赢得客户的口碑,客户反而成了他的推销员,凭借金字招牌,关洪昌逐渐将产品打入各大市政工程,依靠窗帘、桌布赢来一个又一个百万级订单。

渴望搭建低成本创业平台

像王保平、关洪昌等这样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商人、企业家的为数不多,绝大多数人还是从底层创业做起。而信息闭塞、缺乏职业谋划和资金支持是外来建设者在新区创业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1年,15岁的毕海银来到天津开发区闯荡,跟亲戚一起进了一家保洁公司,后来成

长为领班,手下管理着30名保洁员。2006年,毕海银做出了创业选择,开公司做清洁。后来他发现,一些高档住宅业主需要更为规范的家政服务,2014年底又成立了东方蜜蜂家政服务公司,公司员工如今已发展到几十人。他说,如果资金允许,打算开连锁公司,在京津冀发展。

李育珊是一个为了给妹妹挣学费而来到天津新区打工的河北妹子。她告诉记者,刚到大港的时候,自己在迎宾街一家文印店打工,一干就是十年。李育珊回忆说,当时很多农民工兄弟想买个土特产、小日用品等,却没处去买,这让她萌生了开超市创业的想法。

李育珊创业的意愿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没过多久,父亲和姑姑来到大港,带来从村里人手里借来的3万多元钱,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就这样,李育珊靠着努力和吃苦,将第一家超市开得红红火火。随后的几年间,李育珊又尝试着开了几家分店,百瑞达超市的连锁布局由此展开。2009年初,大港区团委的工作人员找到李育珊,希望借助她的连

锁超市为大学生和社会青年创业、就业搭建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百瑞达当年就以直营和连锁加盟的方式新开了近20家超市。

新区支持外来工创业

“滨海新区积极探索支持外来工创业,日前制定并出台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帮助各类创业者在新区将梦想转化为现实,今后,在滨海新区创业将有免息资金保障。”滨海新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对大多数普通外来建设者而言,普遍学历低,起点低,创业之前尤其需要接触企业,了解行业。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目前新区外来建设者的创业领域主要是服务行业,包括服装销售、餐饮娱乐、出租汽车、食品销售、货运、商贸等。不断壮大的外来建设者创业队伍,正成为助推新区生活服务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

政策针对在滨海新区注册、经营的创业

个人及群体,辅助政策专门用于支持首次创业及扩大经营范围的创业者,对申请人规定,可以是持有滨海新区居住证的,这意味着以后在新区的外地人也可申请贷款。

在滨海新区由国家民政部推行的青年外来工融入城市社区试点——向阳街办,目前已有部分外来建设者通过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学到了一技之长,为创业找到方向和定位。

目前,该街办正在建设完善全国首个外来建设者信息平台,该平台将建设外来建设基本数据库,对外来建设的个人信息及服务需求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实现青年农民工信息数据库建设的系统化,进行统一管理,有组织地落实好各项针对性服务举措。更重要的是,外来建设者可以在该网络平台上进行信息交流,分享创业的经验。

“外来建设者基本上都来自贫困落后地区,政府需加大对他们创业的引导与扶助力度,他们的创业路才能越走越宽。”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张盘铭告诉《工人日报》记者。